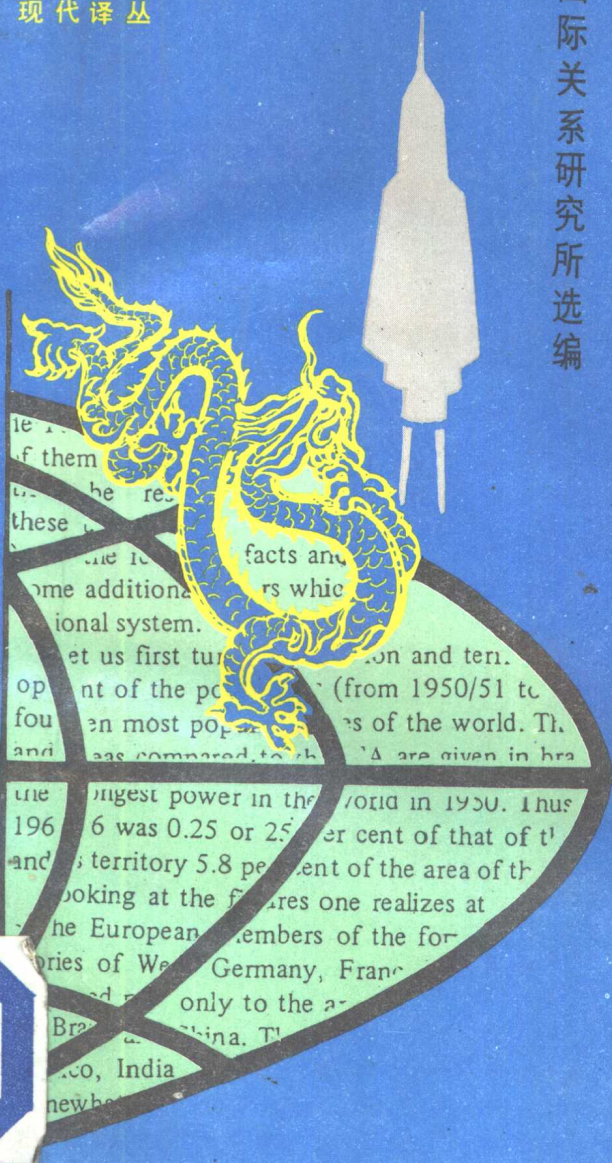




现代译丛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当代世界与中国



时事出版社

现代译丛

当代世界与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时事出版社

当代世界与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009-032-9/Z·02 定价: 2.50元

编 者 的 话

为满足读者从多方面研究和观察国际问题的需要，我们选编了这套《现代译丛》，不定期出版。这套译丛将采用按栏目进行编排的方式，力图使其具备：内容广泛，囊括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体裁多样，诸如学术研究、通讯报道、各种评论、国际知识、历史回忆、新书评介，均可收录；文章可长可短，万字、千字、百字不限。

本辑设置了“国际政治理论”、“展望未来”、“苏联改革”、“美国政治”、“日本经济”、“新书评介”、“电影评论”、“历史与人物”等栏目。选译了世界知名学者和政治家如基辛格、凯南、比亚勒、司徒雷登、竹下登和企业家哈默等的文章。本辑内容从全球到地区、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今天、从书介到影评，多棱镜式地展现了世界与中国之间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将对读者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增加国际知识、开阔视野等有所裨益。

我们希望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并祈批评指正。

目 录

· 国际政治理论 ·

战后世界力量关系的特征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稳定因素

……………〔美〕约翰·刘·加迪斯 (1)

今后可能出现六级均势……………〔瑞士〕彼得·伯恩霍尔兹 (34)

· 展 望 未 来 ·

2000年时世界格局与美苏关系……………〔美〕亨利·基辛格 (49)

未来的国际恐怖主义……………〔美〕布·迈·詹金斯 (54)

· 亚 太 地 区 ·

中国和西欧对美国同样重要……………〔美〕亨利·基辛格 (66)

西方在大西洋和亚太的安全利益……………〔英〕罗伯特·奥尼尔 (76)

90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美〕罗·斯卡拉皮诺 (90)

东亚地区的贸易、技术与安全……………〔日〕猪口孝 (106)

· 苏 联 改 革 ·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美〕休·比亚勒 (120)

苏联改革的前途……………〔美〕乔治·凯南 (149)

• 美国政情 •

美国政党力量的新变化……………[美]威廉·施奈德 (160)

里根下台后的美国

保守主义趋势会继续下去吗

……………[美]伯顿·耶尔·派尼斯 (185)

• 日本经济 •

2000年的世界经济与日本经济…………… (198)

创造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经济国家”……………[日]竹下登 (209)

为了日本和世界的新发展……………[日]安倍晋太郎 (215)

• 新书评介 •

西方会出现大萧条吗…………… (220)

帝国为何衰落……………[美]保罗·格雷 (224)

• 电影评论 •

生不逢时——评电影《末代皇帝》……………[美]费正清 (227)

• 历史与人物 •

走进紫禁城的大门……………[美]阿·哈默 (235)

司徒雷登日记……………[美]司徒雷登 (244)

战后世界力量关系的特征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稳定因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编者按：文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国际体系基本稳定，当前国际体系中促进稳定的因素有两大类：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文章对诸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有系统的分析和论述。

本文曾在1985年于挪威举行的诺贝尔学会和平与战争研讨会上提出并被其他一些研讨会列为讨论文件，后来还编入挪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和平与战争研究》。

谁也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体系事先作过设计以便它能持续很久，甚至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持续很久。这个体系不是在道义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以专断的行径、以触目的人为方式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之后的产物。这个体系中出现过近代史上除战争而外的一些最激烈和旷日持久的敌对行动。如今，这个体系存在的时间却比人们苦心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安排存在的时间长出了一倍，几乎已与19世纪梅特涅和俾斯麦时期的宏大国际体系所延续的时间不相上下，而且与早先的这些体系不相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体系存在了40年之后，

本文选自哈佛大学科学和国际问题中心出版的《国际安全》1986年春季刊。作者是俄亥俄大学著名历史教授。

尚未出现解体的明显迹象。这就——或者说应当——发人深思了。

的确，当人们回忆过去40年来的历史时，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并非“和平”这个词。毕竟在这40年中世界的军备达到了空前规模；出现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有限战争；革命的、种族的、宗教的以及民众的暴力行动比比皆是。此外还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难消除的一些意识形态对抗。而早先的那些灾害——饥荒、疾病、贫困、不公正——也都丝毫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很可能会问，要是把世界各国处理事务时那种无视道义和精神准则的局面称为“和平”，难道不是有些牵强附会了吗？

当然是牵强附会的，但也正说到点子上了。考虑到有种种可以想像的理由说明在过去40年里原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若在任何其他时代这些理由都会成为进行这种战争的充分论据——人们似乎还是值得提一下：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战争；尽管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善后安排有不公正和完全人为的色彩，但迄今它已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也许不是庆贺的理由，但至少可作为进行如下研究的依据：设法了解一下为什么在这么多可触发战争的诱因面前，这次列强间和平竟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同时也想一想有什么办法使这种局面持久下去。因为，我们毕竟是会干出更糟糕的事来的。

体系理论和国际稳定

任何人要想了解为什么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会遇到一个与福尔摩斯侦探案中狗夜间未叫问题完全相同的难题：人们怎样去说明某种没有发生的事呢？人们怎样解释按照以往历史经验的标准今天本应发生的美苏大冲突为何实际上并未发生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一定的研究方法上的困难。的确，说明已经发生的

事始终会比说明未曾发生的事要容易。但是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中还有一种奇怪的偏向助长了这种倾向。杰弗里·布莱恩曾说，“在已出版的有关战争起因问题的书刊里，直接论及有关和平原因内容的，每1000页中还不足一页。”“和平研究”这门学科也深受其害。人们把大得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如何避免世界末日来到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上：鉴于这种末日有种种机会来到，为什么迄今并没有来到。

如果有关战争起因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对战争的起因有了某种近乎一致的意见，那么上述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我们就可以把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意见同1945年以后这个时期的情况对照一下，看看不同之处是什么。但实际上，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用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甚至气象学家，苦心钻研战争起因问题已有多数，然而人们在对出版物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战争问题的了解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现在尚无公认的战争起因理论，在可能找出战争起因的研究方法问题上，也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

国际体系方面的类似研究成果也没有使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增加很多。在这方面困难在于我们的实际经验局限于一种体系——均势体系——的活动。这个体系不是在二次大战前的国际政治所特有的“多极”结构范围内活动，就是在其后的国际政治所特有的“两极”结构范围内活动的。在理论家的脑子里，其他体系依旧是抽象概念，没有什么用处，难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在现实世界中战争是怎么发生的，或者为何没有发生。

但是“体系理论”本身又是另外一回事，人们从中可以找到一个有益的起点，来研究1945年以后国际关系的状况。政治学家们告诉我们，一种“国际体系”在下述两种条件具备时就算存在了。第一，体系内各单位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体系某些部分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部分的变化。第二，作为一个整体，体系的共同

行为有别于它内部各个单位的期望和办事的轻重缓急。当然，若要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这种“相互关系”也并不困难。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是，各大国往往认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几乎很少（如果说还有的话）不是以某种方式增进或损害它们自己的直接利益的。若干国家的集体行为也与各国自己的期望不一致。1945年达成的临时安排40年来基本上依然原样未变，仅仅这个事实就会使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内紧张地凑成临时善后安排的那些政治家们大吃一惊，还很可能吓坏了他们。

体系理论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特点是，它为区分稳定和不稳定的政治结构提供了衡量标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某些国际体系会比其他体系存在的时间长。纽约出版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一书的作者卡尔·多伊奇和戴维·辛格为“稳定”一词下了定义，认为它是“体系能保持其全部基本特征的或然率。这些基本特征是：体系内任何一国不居于支配地位；体系内大多数成员国继续存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多伊奇和辛格还说，具有自我调节能力是这种体系的特色，有能力抵消会危害其生存的外部刺激因素，很像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或蒸汽机的调节器。“自我调节”体系完全不同于他们叫作“自我加剧”的那种体系，“自我加剧”时事态会失控，如森林火灾，吸毒成瘾，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核裂变，当然还有全面战争，尽管他们本人并没有举它作例子。而自我调节机制非常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情况是：体系内各大国间在它们当年参加这个体系以设法予以维护的那些目标上已取得某种根本性的一致意见；体系的结构反映了各成员国间的权力分配状况；确立了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程序来解决各成员国间的分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否符合“稳定”的这些标准呢？它最基本的特征——两极状态——肯定还保持着，因为世界两个最大军事强国以及最邻近它们的手之间的鸿沟同40年前没

有很大不同。同时，无论是苏联、美国或其他国家都未能完全控制这个体系；1945年那个体系中最活跃的国家今天大多数仍是活跃的。当然认为局势“稳定”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认为存在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的概念，作为了解我们过去40年经历的一个方法似乎是有意义的。

但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是什么呢？这种机制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机制同现代史中的其他一些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国际体制的结构在哪些方面相似或不同呢？出现什么环境就会妨碍它活动并把自我调节变成自我加剧呢？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研究战后时期历史和政治的人们的应有注意，人们只是对这些问题作了一系列揣测——考虑到目前的知识水平，他们也只能进行揣测。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几乎是无需再强调的。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有这样的国际体制，它既是稳定的，同时又比现在的体系更加公正，危险更少，而且我们应当继续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除了战争——任何人都不希望战争——以外，国际关系往往是逐渐演变的，变化不是一夜间的事。这意味着，如果出现其他体系的话，它们很可能不会是对当前体系的完全否定，而是以前体系的变种。因此，就更有理由设法了解我们当前的体系，设法区别它的起稳定作用的特性和起破坏稳定作用的特性，设法加强前者，以此作为我们到时候能幸运地干得更好的一个基础。

促成稳定的结构因素

两极状态

任何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时都应当把上述国际体系的结构同组成这个体系的国家的行为区别开来。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存在实现稳定的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单靠行为不能保证稳定，而结构在

某种情况下可以带来稳定，即使它的行为先决条件是不会导致良好结果的。人们只需把1945年的善后安排同1919年的善后安排加以比较，就会清楚这个道理了。

如果完全能够按照政治家的意图办事的话，1919年巴黎和会就会迎来一个世界政治稳定时代，这个时代会同近一个世纪前维也纳会议使欧洲进入的那种时代相类似。巴黎的外交家们肯定是完全想到那次会议的。他们知道胜利付出了什么代价，他们在担当起任务时就认为战争作为解决国家争端的一种手段恐怕已完全不中用了。和平谈判代表中很少有人（如果说还有的话）能够像1919年那样得到一大批有技术专长者的帮助。此外，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伍德罗·威尔逊，决心要超越“老式外交”的实践和程序，作出一种把力量和道义结合起来的善后安排。据说，威尔逊曾对他的顾问们说，“告诉我正确的目标是什么，我将为之战斗”，至少就自决的主张而言，凡尔赛条约比现代史中任何一个条约都更接近于采纳了正义原则。

说来不幸，凡尔赛条约在这样做时忽视了力量的现实情况。条约打散了旧的奥匈帝国，此举完全反映了有关民族的愿望，但没有使继而出现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及匈牙利这些国家获得维护其新的主权地位所必要的军事和经济手段。更缺乏远见的是，条约没有设法来调节两个国家——即德国与苏俄的利益，而它们的人口和工业力量肯定会使它们对欧洲战后事态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因此，对凡尔赛体系终于在1939年崩溃，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它的崩溃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在牺牲东欧人的情况下作的一笔交易的结果，因为在20年前只顾维护正义，忽视了这两个国家的力量。

形成对照的是，没有人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安排说成是正义的胜利。这项安排武断地使德国、奥地利及朝鲜这些主权国家陷于分裂，这不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是因为

美国与苏联无法就谁的占领军应首先撤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一安排没有设法阻止几个国家被并入苏联势力范围，直到今天它们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而这几个国家的独立曾得到1919年安排的承认。就波兰来说，大不列颠曾于1939年不惜诉诸战争以保护它的独立。为了对此采取对策，美国在西欧、地中海和太平洋建立了势力范围，虽然它在重要的方面与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同，即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大多是自愿支持美国的。但不管多么自愿，它们在国家独立方面也需要作某些牺牲。

其结果是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力量两极化。在古代世界只有过有限的两极体系；确实，希腊历史家修西狄底斯关于雅典人同斯巴达人之间的敌对的描述肯定仍会使我们当代人感到可怕；冷战时代的政治家也不会忘记他们在学生时代就熟悉的罗马与迦太基的对抗，但这些都是地区性冲突而不是全球性的。直到1945年人们才能似乎有道理地谈论世界已划分为两个互相竞争的势力范围，或者谈论控制这两个势力范围的超级大国。汉斯·摩根索于1948年《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写道，国际形势已变成“两个巨人以警惕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对方的这种远古景观……”。因此，遏制他人不然就被人遏制、征服他人不然就被他人征服、消灭他人不然就被他人消灭，已成了新外交手腕的格言”。

今天和40年前一样，许多人似乎认为两极状态是人们安排政治的一种落后而危险的方法。按简单的几何推理，一个依靠三个以上支撑点的体系会比依靠两个支撑点的体系稳定。但政治学不是几何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人们已经看清楚，国际关系的两极体系中有某些结构上的稳定因素，而在以前的多极体系中是不存在这些因素的：

(1) 战后的两极体系现实地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谁握有军事力量的现实，今天仍是它们握有军事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同1919年的善后安排显然不同，1919年的安排很少照顾

德国和苏俄的利益。诚然，在其他类别的力量方面——特别是经济力量方面——一些国家自那时起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已向苏联和美国挑战，甚至超过它们。但西德、巴西、日本、南朝鲜、台湾及香港等国和地区的政治地位表明，高效地生产录相机、摩托车，甚至汽车和钢铁的能力，尚未变成接近于像华盛顿或莫斯科在世界各地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的那样一种力量。

(2) 1945年后的两极结构是一个并不需要老练的领导人来维持的简单结构。19世纪庞大的多极体系之所以垮台主要是由于它十分错综复杂，它们需要有一位梅特涅或一位俾斯麦那样的人来维持，而当找不到那种能力的政治家时，它们往往就会瓦解。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制度都不适合于物色具有同样功夫的政治家并委以重任；执掌外交政策的明显能力几乎不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选择领导人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国际关系的两极结构（由于涉及两个主角的风险必然很大），不管有关的人物怎样，往往会使他们产生谨慎与克制感，并会阻止他们的不负责任行为。《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作者肯尼斯·沃尔兹指出，“这并不是说人们抱有空幻希望，希望美国和苏联的一切未来统治者几乎能把一切美德集于一身，而是认为两极世界的压力会有力地鼓励他们在国际上行事时比他们的性格使人预期的要好一些。”

(3) 由于结构相对来说是简单的，这种两极体系中的联盟会比19世纪和1919~1939年时期的体系稳定。人们会感到吃惊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寿命现在已经和第一次大战前的时间最长的联盟（即德国同奥匈的联盟）一样长了。它几乎是法俄联盟寿命的二倍，而且肯定比两次大战之间任何脆弱的联盟要长得多。北约的主要对手华沙条约组织几乎也已存在同样长的时间。原因很简单：说到底，联盟是不安全状况的产物，只要苏联和美国对于对方来说以及对于其各自的保护国来说继续是世界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任何超级大国在维持其联盟方面都不会遇到很大困

难。在多极体制中，不安全的根源要复杂得多。因此，联盟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安全的根源的变化，是不足为怪的。

（4）同时，也许由于基本的联盟体系在总体上很稳定，所以当中国、古巴、越南、伊朗和尼加拉瓜叛离美国阵营时，当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埃及、索马里还有中国离开苏联阵线时，美国和苏联容忍它们的叛离行动，没有出什么大乱子。而一个力量对比更微妙的多极体系出现这种变化时本来是可能发生大乱子的。一个幅员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冷战期间两次改变其结盟关系而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产生任何戏剧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表明两极关系带来了稳定。读者不妨把这一情况和1914年前诸如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事件或者该由谁控制摩洛哥这类显然是小小的插曲所产生的影响作一番比较。两极化的一个奇怪的后果是，在两极体系中的联盟比多极体系中的联盟更持久，同时大国也更能忍容叛离现象。

简言之，在战后，在没有人进行过设计，也没有人试图考虑保持正义的情况下，幸好各国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对维持国际秩序（即使不是正义）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因为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现实力量基础之上的。

独立而不是相互依赖

如果说，两极的结构本身促进了稳定，那么，苏美双边关系的某些固有特点也是起了作用的。在冷战开始前的时期，人们的时髦做法常常是指出，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关系尽管时紧时松，但他们却从未真正打过仗。但是，对于美国和苏联各自同英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日本或者法国（如果把美国不宣而战的1798~1800年海战也算在内的话）的关系史，人们就不能这么说了。从意识形态上说，俄国和美国的政体的差异恐怕是再大不过了。因此，美苏关系的这一记录就更加令人触目。1943年罗斯福和斯大林首次会晤甫结束，历史学家福斯特·雷亚·杜勒斯

就指出，“苏美发展友谊不会是轻而易举的。然而在过去，友谊是根深蒂固的，在那些年月里，共同的利益超过了其他所有分歧，友谊得到了发展。这一事实标志着它们会朝着建立一种新的和解关系而努力。这种和解不仅符合两国当前的利益，而且符合它们长远的利益。”

冷战的发生使这个论据看起来不那么令人信服了。研究美苏关系的学者认为，如果力言美国和俄国的关系曾经是友好的，那就是把和谐同无所作为混为一谈。由于俄美之间在19世纪接触不多，它们的“友谊”传说显然是很一般的。20世纪初，美苏接触增多，它们的接触一旦多起来，冲突就接踵而至，当时西方政治家甚至还未开始对布尔什维克或迫在眉睫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感到不安。但是，即使在这种融洽关系破裂后（且不说这种关系是实际存在还是仅仅为一种想像），杜勒斯的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尽管俄国人和美国人在过去不同时期几乎同所有其他大国都打过仗，但是，却仍然没有发生过俄美战争。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俄国和美国政府实际奉行的政策之外，俄美关系本身似乎存在着促进稳定的结构因素。

国家之间的联系越广泛，和平的机会就越大，这是人们早就提出的一种古典自由主义假设。人们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战争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打仗对那些在重要商品上互相依赖的国家来说是吃不消的。人们认为，文化交流使各国人民对彼此关注的事更为敏感，从而减少发生误会的可能。还有人说，“民间”往来使各国加深彼此了解，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从而也相应减少。

这些都是人们愿意相信的好事。不过，能够证实这些好事的证据却寥寥无几。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最激烈的内战和最残酷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人民彼此很相似，关系又很密切的地方。不妨运用密执安大学《与战争相关的情况》这个科研计划

提供的统计数作为例子，考虑一下例如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代价最大的军事冲突：在10次最残忍的国家间战争中，每一次都发生在紧邻之间或者彼此在贸易上来往频繁的国家之间。无疑，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并未阻止1914年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走向战争。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也没有阻止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1945年以来，内战比国家间战争更频繁，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人怀疑相互依存必然会促成和平的论点。

由于在很大程度俄美两国同世界其他部分有非常广泛的事务，所以两国一直是彼此互不相干。两国位于地球两端的这一简单事实同这一情况有些关系。在地理位置上彼此遥遥相隔，这就很少可能发生像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或者波兰走廊或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耶路撒冷等问题上出现的重大领土纠纷。在苏美（或它们的代理人）的武装力量发生直接接触的少数地区，它们建立了像朝鲜非军事区或柏林墙那样的人为屏障，也许这是无意中承认了美国一位诗人写的使人寒心的箴言：“篱笆筑得高，邻居关系好。”

美苏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十分严重。无疑，美国不需要从苏联进口它无法从别处得到的东西。当然，对俄国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即使苏联人从美国进口大宗粮食，而且也想从美国进口先进技术，苏联也远没有完全依赖这些进口商品。最近我们以拒绝向美出售这些商品的办法来改变苏联行径的努力所遭到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俄国人和美国人在经济领域中能伤害对方的地方相对来说不多，对这一点双方决策人可能感到沮丧。但是，从国际稳定的角度上看，很可能幸运的是，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自给自足程度最高的国家。

但是，国际交流的扩大能促进和平的这一论点又怎样呢？俄